



## 目 录 Contents

<b>致中国读者</b>	1
<b>译者序</b>	13
<b>作者序</b>	43
<b>编者序</b>	53
<b>第一章 俄清外交、贸易关系的确立与俄罗斯汉学的产生</b> ..... 1	
一  俄罗斯第一批关于中国的消息和实用信息的积累	1
二  佩特林的使团	6
三  拜科夫的使团	12
四  斯帕法里的使团	19
<b>第二章 俄罗斯汉学的形成</b> ..... 28	
一  《尼布楚条约》与商队的对华贸易	28
二  劳伦茨·朗格和他的中国之行	32
三  来俄的中国使团	39
四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设立	42
五  罗索欣	49

## ——俄罗斯汉学史

六 第一位汉学家院士哥特利布·西格弗里德·拜耶尔 .....	67
七 周戈和他的翻译学校 .....	70
八 第三届东正教使团 .....	76
九 第四、第五届东正教使团阿列克谢·弗拉德金和 伊万·贝科夫 .....	78
十 列昂季耶夫和他的汉学著作 .....	83
十一 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 和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 .....	99
十二 安东·弗拉德金，他的学派及满学著作 .....	104
十三 第八届东正教使团，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 .....	109
十四 商人费奥多尔·谢戈林的中国贸易研究 .....	112
<b>第三章 俄国汉学的“比丘林时期” .....</b>	<b>117</b>
一 比丘林和第九届东正教使团 .....	119
二 比丘林的彼得堡时期（1822~1840年） .....	131
三 比丘林和恰克图汉语学校 .....	149
四 比丘林学术活动的最后阶段 .....	159
五 加缅斯基及其在俄罗斯汉学中的作用 .....	173
六 彼得·加缅斯基的使团（1820~1830年） .....	178
七 利波夫措夫和列昂季耶夫斯基 .....	185
<b>第四章 从使团到大学 .....</b>	<b>196</b>
一 第十一届东正教使团 .....	196
二 瓦西里耶夫、卡法罗夫和扎哈罗夫随第十二届 使团前往中国 .....	211



三 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赫拉波维茨基	219
四 斯卡奇科夫及其关于中国的重要著述	222
五 医生巴济列夫斯基、画家奇穆托夫以及 五六十年代初的其他汉学家	234
六 第十四届东正教使团	243
七 卡法罗夫的后期活动	250
八 医生布列特施奈德及其关于中国的著作	256
九 俄国东正教使团的监督官们	260
十 科瓦列夫斯基及其《中国游记》	267
<b>第五章 瓦西里耶夫与俄国汉学学派的形成</b>	<b>272</b>
一 喀山大学的汉学	272
二 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瓦西里耶夫	288
三 瓦西里耶夫的教材	301
四 瓦西里耶夫研究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历史的著作	304
五 新的大学章程和毕业后的困难	307
六 东方系的教授和教师（19世纪70年代）	311
七 瓦西里耶夫晚期的活动	320
八 瓦西里耶夫的后继者——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和 伊万诺夫斯基	332
九 东方学家——瓦西里耶夫的弟子	339
十 东方系的母语教师	347
十一 中学汉语教学的尝试	348
十二 库伦和伊犁的东方语言学校	349
十三 俄罗斯汉学与西欧汉学的联系	353
十四 第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356

## ——俄罗斯汉学史

第六章 世纪之交	362
一 海参崴的东方学院	363
二 20世纪初的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373
三 东方系汉语教学的新气象，伊万诺夫和 阿列克谢耶夫	380
四 大学生的学术论文	389
五 俄罗斯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	392
六 东方学学会	399
七 实用东方学院	405
结束语	409
附录一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调查表和信件	417
附录二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名单	421
附录三 本书所使用的官方档案资料	427
附录四 俄罗斯汉学家的手稿遗产	457
附录五 人名索引	536
附录六 地名索引	560
附录七 其他专名索引	571
附录八 本书所使用的缩略语	581

##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这本书能以你们的母语出版，我很高兴。此书讲的是俄罗斯怎样逐渐了解你们这个伟大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那些来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不止一两年的俄罗斯人，如何学习中国的语言，着迷于中国文化，努力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给自己的民族。这正是汉学的主要作用：拉近民族间的距离，努力帮助他们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方的传统、习俗。在当代，这已成为我们两国的国策——2006年定为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定为俄罗斯的中国年。然而在遥远的过去，却需要付出很多艰辛、耐心和毅力，才逐步使我们两个国家和人民达成相互理解。300年，这是俄国汉学已走过的历史岁月，其间俄国汉学家为了俄罗斯了解中国，也为了中国了解俄罗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您手中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我的导师彼得·叶梅利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去世后为我留下了这部书的手稿，他曾不得不把初稿压缩了几近一半。我花了10年的时间准备手稿的出版，力求全面恢复手稿原貌，以此回报恩师。然而正如中国的《易经·系辞上》中所说，“书不尽言，言不

尽意”。这部书稿有一个特点，它是开启俄国汉学档案资源的一把钥匙，俄国的档案资料蕴藏着许多有价值的材料，这部书稿为进一步发展学术、进行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发现打开了一扇窗户。

П. Е. 斯卡奇科夫那一代人，是以俄罗斯和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审视祖国的命运变迁的，这样进入了革命年代。这一代人承担的责任，是把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东西传递给能够理解其真正价值的后继者，俄罗斯文明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巍然屹立，他们经受了国内战争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那场毫无道理的大清洗运动。

我的导师是怎样的人呢？1949 年夏天，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去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使命的时候，П. Е. 斯卡奇科夫正被流放，住在西伯利亚离小城坎斯克不远的塔谢耶夫镇。

塔谢耶夫镇是他 1949 年 1 月 25 日第二次被捕后的服刑地，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于 1937 ~ 1946 年间他曾先被关在监狱，后来又被押送到科累姆的集中营。在塔谢耶夫镇，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区里的集体农庄学校工作，教会计课，后来又在塔谢耶夫木材采运企业供应处当统计。他家的部分成员（妻子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女儿玛丽娜和亚历山德拉）后来得以在这里团聚。直到 1954 年，П. Е. 斯卡奇科夫一直在塔谢耶夫镇继续增补他那部著名的《中国书目》，与列宁图书馆通信，并构思关于伟大的汉学家比丘林的电影剧本。精神世界强大有力，是他们这一代俄罗斯同胞的突出特点，他们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的大清洗中都经历了非人的磨难。

在集中营能活下来——这是很严酷的考验，为了生存下去并保持精神力量，需要有远大的目标，使环境不致摧毁自己的品格。

1956 年彻底平反之后，П. Е. 斯卡奇科夫回到了列宁格勒，他依旧乐观、开朗、善于交际，坦诚待人。他为自己制定了特殊的工作和休息规则，先一气不停地工作两三周，然后找个地方去户外写生，回来后再开始紧张的工作，如饥似渴地希望能够完成那些大的



课题。那还是在他和家人遭遇悲剧之前就计划好了的，虽经多年令人绝望的不公和非人的折磨，他仍没有放弃。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珍藏的俄罗斯和外国古典音乐，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放松。

是 П. Е. 斯卡奇科夫一家难能可贵的精神力量，帮他顶住磨难并支撑了下来，重新找到自我并进行学术工作。在他的家庭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相互间忘我的忠诚不渝，尽管表面看来总是戏谑笑闹、互相揶揄。

不过这些还都是彰显于外的性格特点，其内在核心却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工作中形成的。现在，П. Е. 斯卡奇科夫家里还珍藏着他的回忆录，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为父亲写了小传。我们以他的家庭档案为基础，已能了解到 П. Е. 斯卡奇科夫优异品格形成的主要时期。

从童年起，П. Е. 斯卡奇科夫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对旅行很感兴趣，读了大量旅行方面的书籍。但他只到过伏尔加河沿岸和克里米亚，不过想象中他走遍了全球，甚至“走遍了”日本和中国。

1911 年中学（彼得堡商业学校）毕业后（他在这所学校学了英语），П. Е. 斯卡奇科夫去服兵役，在诺夫哥罗德省第 37 炮兵旅作为“志愿兵”服役一年，后因对军队工作不感兴趣，他作为临时聘用人员进入了国家储蓄银行。

1913 年，他想去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工作，于是决定学习汉语，并去了解了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和实用东方学院的情况。

但他不可能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因为那里是白天上课，而他不能放弃储蓄银行的工作，因为他的工资是全家唯一的收入。实用东方学院同样有汉语课，正好是晚上上课。

1913 年春，П. Е. 斯卡奇科夫来到了实用东方学院，他根据入学要求递交了申请入学所需要的一些资料。在准备入学的时候，他开始阅读在大众文化馆里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个文化馆离利戈夫卡街很近，他就是在这条街的一栋楼里出生并一直住在

这里。

在实用东方学院，可以看到和 П. Е. 斯卡奇科夫一样穿着学生服听课的许多人物，其中有在 П. Е. 斯卡奇科夫入学前毕业于汉日专业的鲁多夫（В. Н. Рудов）、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教授和院士。

汉语课准时在 9 月 1 日开始。П. Е. 斯卡奇科夫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是斯梅卡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斯梅卡洛夫 1902 年以一等毕业证书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但家庭情况却不允许他研究学问，他去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工作，后来去了中国，1907 年返回彼得堡后开始教授汉语。

斯梅卡洛夫教汉语语法很有特点，他事先声明，他的教学方法是通过阅读中文报纸让大家从实践中学会语法。的确，他在讲语法时引用大量例句和从中文报纸上摘下来的短文。

第二位老师是教口语的中国人张玉广，他的俄语说得相当好。不知道张先生在中国受过怎样的教育，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是他留给所有学生的印象。

主要的教师是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教授，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伊凤阁于 1902 年大学毕业，留校在汉满语教研室工作，他的几篇关于唐古特手稿的文章特别有名。

伊凤阁在彼得堡的实用汉语教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 世纪初的俄国政府极缺汉语翻译人才，只有海参崴东方学院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毕业生才能胜任，而像伊凤阁这样的高水平汉学家更是奇缺。他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都十分过硬，是与中国有工作关系的俄国政府各部门的重要顾问，名气很大。苏联时期，伊凤阁是外交部的翻译，并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几年。

伊凤阁除了带学生阅读文选外还教授汉语语法。在学生接触了书法之后，伊凤阁用自己在北京发表的教材讲授行书。

除了汉语课，学生还要听领事法课，学中国地理，讲授这些课



程的是斯梅卡洛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 1914 年 8 月，П. Е. 斯卡奇科夫作为预备役准尉应征入伍，被派往前线。从 1918 年底起在红军服役。

直到 1920 年，当他成为西伯利亚红军某部作战司令部首长，住在鄂木斯克，他才得以短时间地恢复汉语学习。

在鄂木斯克住着很多中国人。П. Е. 斯卡奇科夫从一个中国人手里买了一包香烟，还让这个中国人再往家里送一包。就这样他认识了这个叫范登元的中国人，此后范登元每天晚上去 П. Е. 斯卡奇科夫家里教他汉语。无法判断范登元在汉语方面的学识，不过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他的汉语发音和实用东方学院的口语教师张玉广一样棒。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司令部的工作非常繁忙，晚上回家很晚，有时甚至不回家，所以跟范登元学习也很不规律，不过几近忘记的汉语总算有所恢复。

范登元和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孩子们相处得特别好。他没有家室，孩子们每周去他家两三次，小姑娘们在那跳舞、朗诵诗歌，回家的时候他总是送一些当时很稀缺的糖果。范登元告诉 П. Е. 斯卡奇科夫，孩子们的到来使他家里像过节一样。1920 年的 4 月或 5 月，这段汉语学习就结束了。

1921 年 8 月，领导推荐 П. Е. 斯卡奇科夫去司令部的学院学习。8 月中旬他来到莫斯科，打算进东方系，他已经了解到，那里教授汉语。

见了学院的负责人——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西伯利亚时的上司阿法纳西耶夫 (Ф. Афанасьев)，阿法纳西耶夫说最近总司令托洛茨基 (Л. Д. Троцкий) 有令，这一年不招非党学员，学校请他明年再来。可以想见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心情多么沮丧，他想重学汉语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1922 年，П. Е. 斯卡奇科夫转业来到彼得堡应用东方语言学院，这是一所半军事化的学校。

1922 年 9 月初的一天，П. Е. 斯卡奇科夫一个人坐在学校的教

室里，他不知道会有哪位教授来授课。铃声响后，一位高大结实的人走进教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他和П. Е. 斯卡奇科夫谈了起来，问他从哪来，为什么选择汉语，最后阿列克谢耶夫声明：“在没有通过俄语语法考试之前，我不会教您汉语。”接着他阐述了这个要求的目的，并说这个要求是针对他所有学生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已年近三十，在中学毕业12年后，他再次拿起了俄语课本。这一次他顺利地通过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语法考试，阿列克谢耶夫只给他提了两三个简单的问题。

接下来的第一节课的上课地点是阿列克谢耶夫家——同一座楼再高两层的书房。阿列克谢耶夫告诉П. Е. 斯卡奇科夫应该用什么词典，建议他读瓦西里耶夫院士的一些书，并要求他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司空图的诗品》一文。直到这一学期结束，П. Е. 斯卡奇科夫是阿列克谢耶夫唯一的学生。

阿列克谢耶夫的第二节课是阅读、翻译《聊斋》，中间穿插讲解汉语的特点，作业是下一次课前独立地翻译一点《聊斋》。尽管П. Е. 斯卡奇科夫过去跟随伊风阁学过一年多的汉语，但阿列克谢耶夫所讲的对П. Е. 斯卡奇科夫来说却是全新的，很吸引人，从此汉语方块字的原文对他来说具有了不可言说的魅力。

阿列克谢耶夫的课每周两三次，每次两小时。教学要求相当严格，П. Е. 斯卡奇科夫得花大量的时间用于课前准备。

在寒假和暑假，阿列克谢耶夫都会布置很多作业——翻译未经点校的汉语文言文。例如1923年夏天，他给学生们一本传记文章，让学生任意翻译其中的一篇。П. Е. 斯卡奇科夫选了一篇“中国将军”，开始了绞尽脑汁的翻译历程。秋天作业交了上去，阿列克谢耶夫看罢问道：“我读了您的译文，但不明白——请问是谁打死了谁？”这个问题译者自己也没弄明白。

第二年是读《辞源》，阿列克谢耶夫布置的作业是翻译其中的



几页。

第三年是翻译各类文章，阿列克谢耶夫特别重视成语，翻译和理解成语对于掌握文言文来说非常重要。

1925 年 П. Е. 斯卡奇科夫前往中国，主要是长城以外的北方。

同所有的学生一样，大学时代极为短暂。这一天，列宁格勒实用东方语言学院所有毕业生都得到了“红色东方学者”的证书，每人还得到了一本巴托尔德的《东方研究史》，上面写有学校赠给某某同学的字样，并有巴托尔德的签名。

П. Е. 斯卡奇科夫向外交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去中国工作。在等待了 6 个月之后，派他为驻塔城领事馆秘书的任命才由他的妻子从列宁格勒寄来，而此时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当 П. Е. 斯卡奇科夫在张家口苏联军事顾问队工作后，游遍中国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知道他的两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坐车从张家口到苏联边境，第二次是从北京经华中、华南各城市前往广州。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这一时期开始记日记，但只是简单的几句提纲。但这些记录在我们看来却是极有价值的资料，说明了他与苏联帮助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时值 1925 ~ 1927 年间，中国革命处于高潮，北伐成功，各党派加强了统一战线活动，反动势力则试图进攻共产党，民众力量也参与到与军阀的斗争之中。华北的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军冯玉祥的苏联军事顾问队就驻在华北。1926 年 11 月，各地军阀在天津召开会议，会上决定组建以张作霖为首的反革命同盟——“安国军”。

1926 年 8 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苏联给予国民革命军以很大帮助，在张家口顾问队参与下制订了培养军官的计划，并确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法。从苏联运来了各种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和飞机。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条件十分复杂和危险。1927 年春，中国的反革命力量发起了全线进攻，这段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就是 1927 年 4 月 6 日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袭击。张作霖的军警搜查

抢劫了武官的住所和苏联公民的房间，有很多人被捕。同时被捕并遭受酷刑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和他的一批年轻战友。这一事件 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专章进行了介绍。

当 П. Е. 斯卡奇科夫从中国回到列宁格勒时，他又与终生爱戴的阿列克谢耶夫见面了。那是 1929 年，在东方学研究所，此时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已经是图书馆馆长，并且正在攻读研究生。1930 年秋，鄂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邀请 П. Е. 斯卡奇科夫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П. Е. 斯卡奇科夫开始与阿列克谢耶夫经常见面、交谈。

每星期一，在东方学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室都要召开全室研究人员和应邀前来的汉学学者的会议。在这样的会上，总会有人作报告，大多数情况下是主持会议的阿列克谢耶夫本人提出报告，讨论中国的新书，并给予详尽的评价。这些书评和报告，开阔了研究所人员的知识面，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引导他们关注思考那些了解尚浅的汉学问题。

除了这种会议外，中国研究室还定期开展“难句讨论会”活动，由把《易经》译成俄语的舒茨基（Ю. К. Шутский）发起。在翻译中遇到疑难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问题带到讨论会上。当然，仲裁官常常是阿列克谢耶夫。这些都是对大家有益的高水平的会议。

1956 年 12 月，莫斯科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坐落在中国路上，在条件完备的电站建设部大楼的一层和二层。里面长长的走廊是这座大楼的标志，这是研究人员互相交流的主要场所。大家都十分熟悉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身影，一般每月都会出现两次，像田野上的播种者，穿越这块学术的园地。他从列宁格勒来，带来的不仅是东方学同行的消息，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П. Е. 斯卡奇科夫常常会告诉大家一些图书信息，写在一张张小纸和卡片上，或者是与所里同事的课题相关的材料，“我



找到了点对您有用的资料……”成了他和大家见面时常说的一句话，接着就会拿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卡片。没有卡片或笔记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友好的微笑、善意的玩笑和给年轻人的一点糖果或小礼物。

П. Е. 斯卡奇科夫每次到来，都是所里的一件大事。所里的年轻人（年轻人是这个研究集体的主体）都离不开他，他们被他善良的心地、绝无仅有的中国学识、善于工作和组织别人工作的能力所吸引。“不很年轻的”也对他特别尊敬，他们都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鄂山荫（И. М. Ошанин）、杜曼（Л. И. Думан）、艾德林（Л. З. Эадлин）（他们分别比П. Е. 斯卡奇科夫年轻8岁、15岁、18岁），还有岳特金（Р. В. Вяткин）和从1959年起主持研究所工作并也属于“阿列克谢耶夫派”的齐赫文斯基（Б. С. Тихвинский），当时齐赫文斯基刚过40岁。

П. Е. 斯卡奇科夫与那些一起经历古拉格集中营地狱般磨难的几个人保持着患难之谊：克雷莫夫（А. Г. Крымов）（即“郭绍棠”——译者注）、杜巴索娃（З. С. Дубасова）、佩尔利（Н. А. Перли）、梅尔纳克斯尼斯（А. И. Мелнакснис）等，还有不在研究所工作但也专注于自己撰著的人，如他最亲近的好友马尔科·伊萨阿科维奇·卡扎宁（Марк Иссаакович Казанин）。在他们眼里，П. Е. 斯卡奇科夫是具有良知和高尚品格的人。

1958年，由П. Е. 斯卡奇科夫指导和直接参与整理的两本书得以出版——《太平天国时期的北京》（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和《1689～1916年间的俄中关系文件》（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新版的《中国书目》也进展顺利。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于1960年出版，令学界叹为观止。可能学界开始时甚至不能充分认识这部著作对于学术进一步发展的真正意义。而П. Е. 斯卡奇科夫则继续执著于编著《俄苏汉学家书目词典》，这个构想后来演变为《俄罗斯汉学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一书。正是这部著作，按着作者的构想，再现了俄国数十位汉学家的生活，再现了那些被生生剥夺了其在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权利的人的生命历程。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成绩被苏联汉学家视为俄国学术界的共同成就。他所出版的著作，能够激发起每个人的学术兴趣。另外，一些杂志和文集也经常登载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文章。他不倦地研究着档案和手稿资料，研究官方的和一些记叙性的原始材料，而刻苦钻研的结果，则是引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有价值的结论。

1962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隆重纪念 П. Е. 斯卡奇科夫七十诞辰，收到了很多热情诚挚的贺词。主要的学术杂志——《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亚非各民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都报道了这件大事，在《亚洲民族研究所通讯》的中国专刊上登载了 П. Е. 斯卡奇科夫小传和著作目录。七十大寿时 П. Е. 斯卡奇科夫不仅收获了以往研究的成果，还实现了一些新的构想。最主要的是他在比较短的时期里培养了后备人才。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紧密地将断裂的时间联接了起来，实现了俄国汉学几代人的传承。

在中国，П. Е. 斯卡奇科夫作为俄罗斯汉学家广为人知。1957年，中国历史学者张一东开始与斯卡奇科夫通信。“尊敬的 П. Е. 斯卡奇科夫同志”，张一东在1957年11月的信中写道，“首先向您祝贺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向您问好！感谢您为我解答明万历皇帝的文书问题。我没能及时给您回信，因为我正在准备哲学考试。现在我已通过毕业考试，正准备答辩。真希望以后继续得到您的帮助”。同年12月，张一东说，他将于1958年1月底来莫斯科，要拜访П. Е. 斯卡奇科夫。张一东的论文题目是《伟大的地理发现与中国》，其中的一章就是《俄罗斯与中国》，所以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意见对作者是十分珍贵的。

北京师范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迟宗海给П. Е. 斯卡奇科夫写信，



说他想当他的学生。迟宗海是从《历史问题》杂志上那篇祝贺斯氏七十寿辰的文章里知道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他坚持学俄语，研究两国关系史，并请求赠给他一部 П. Е. 斯卡奇科夫编的《1689～1916 年间的俄中关系》。在 1962 年 5 月 8 日的信中，这名中国大学生是这样落款的：您的学生迟宗海。

但是残酷的病痛消耗着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生命时光，他努力保持旺盛的工作精力，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有的人都为这样一位卓越学者和出色的同胞的离去而感到难过。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亚非各民族》杂志编辑部、国立列宁图书馆、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发表的悼词，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在苏联汉学领域，生活经历丰富的老一代学者已经所剩无几，现在工作的大部分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学术研究的。П. Е. 斯卡奇科夫就是这一代为数不多的学者代表之一。他的为人使所有人感到一种慈父般的关怀，因此为所有的人所敬重。一个被别人热爱、怀念的好人，是不会死去的。一位优秀的学者，只要他的著作还为人所用，他虽逝犹生。П. Е. 斯卡奇科夫就将这样生活在我们中间。希望青年学者能够继承他谦逊、勤奋和无私奉献于学术的精神。

生活会证明这些话的公正和睿智。

B. C. 米亚斯尼科夫

## 译者序

### ——学术传承：俄罗斯东方学和汉学史上的 《俄罗斯汉学史》

1977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委托苏联“科学出版社”的“东方文献总编室”出版了一部具有重要学术史意义的著作——《俄罗斯汉学史》<sup>①</sup>（*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这是一部内容厚重、凝结着两代俄罗斯汉学学人心血的经典力著。该书的原作者在苏联的政治风雨中历经坎坷，但坚持梳理俄罗斯汉学研究历史的学术追求，即使在其遭受非人磨难的日子里也未曾动摇。遗憾的是，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在苏联特殊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下，这部著作却未能出版；同时又令人感到庆幸的是，作者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当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从刚踏上学术生涯的时候起，就在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指导下工作，为缅怀和纪念先师，他倾尽

<sup>①</sup> 中国学者在提到此书时常有人将此书冠以“俄国汉学史纲要”之名，细究原文书名，“русский”一词指广义的俄罗斯民族而非国家，故采用“俄罗斯”而非“俄国”与之相对；“ очерк”一词单数形式意为“轮廓”、“叙述”、“概要”之意，复数形式为“文集”之意。本书作者通过对俄罗斯汉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再现俄罗斯汉学发展的历史。经请教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本书中译本定名为“俄罗斯汉学史”。

十余年之功，整理、编辑斯氏遗稿，使中外学界得以通过这部以大量档案文献为基础的著作，了解俄罗斯汉学发展的轨迹，认识俄罗斯汉学的成就和价值。

《俄罗斯汉学史》一书是 П. Е. 斯卡奇科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以及其他城市的档案馆的成千上万份手稿、文件、年表中认真爬梳、总结俄罗斯汉学 200 多年的研究，撰写而成的。作者从 1913 年起开始关注中国，虽亲身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战争、在 20 世纪 30 ~ 40 年代大清洗时期又两度身陷囹圄，但对汉学研究却孜孜以求，俄罗斯汉学界对其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怀有深深的敬意。1962 年是斯氏的古稀华诞，当时苏联汉学最重要的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亚洲各民族研究所召开纪念会议，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亚非各民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和《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上都专门发表了纪念文章。1992 年是斯氏百年诞辰，俄罗斯汉学界缅怀驾鹤西去的前辈，在 1991 年提前一年在最重要的汉学期刊之一《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上连载斯氏在其生活中最艰难时期所留下的笔记。1992 年 2 月 14 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1993 年，专门纪念斯氏百年诞辰的《时代的联系没有中断……》<sup>①</sup> 由当前俄罗斯汉学重要代表人物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主编出版。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撰长文研究斯氏日记中所反应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感叹其在逆境中对汉学研究的不懈追求以及其在经历了 14 年的劳改生活、重获光明正大的学术研究权利后对同事及后学的支持和帮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沙塔洛夫（О. В. Шаталов）整理了现藏于该所档案馆的“П. Е. 斯卡奇科夫全宗”（共计 150 件），包括以 1951 ~ 1964 年间和 1936 ~ 1948 年间的两部分资料。斯

<sup>①</sup>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 М. , 1993.



氏留下的档案以前一部分为主，反映了他在俄国汉学史、东方学史以及 17 世纪以来的俄中关系史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档案较少，反应了斯氏在中国书目文献领域的研究。对于 П. Е. 斯卡奇科夫的手稿《俄罗斯汉学家的手稿遗产及其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意义》(Рукопис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русских китаеведов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使我们了解到斯氏在俄罗斯汉学手稿研究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2003 年，圣彼得堡出版了《人与命运——苏联时期政治恐怖的牺牲品—东方学家生平词典》，该书的“П. Е. 斯卡奇科夫”一条中，<sup>①</sup> 扼要地再现了斯氏的一生和学术成就。同俄罗斯汉学学者和各国研究、关注俄罗斯汉学的学者一样，中国学者同样把斯氏的《中国书目》、《俄罗斯汉学史》作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在《俄罗斯汉学史》在苏联问世后的第三年，王瓘在 1980 年第 3 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上便发表长篇提要介绍该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中心开始组织翻译。然而世事辗转，在主要译者孙越生先生去世后，已完成大部的译稿不知去向。2002 年开始启动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编译丛刊”对该书的重视，使中译本得以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 一 本书的作者：彼得·叶梅利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

彼得·叶梅利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 (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92–1964) 于 1892 年 2 月 14 日生于彼得堡附近卡卢加省的一个农民之家。1911 年毕业于彼得堡商业学校后在国家储蓄银行工作。1913 年，П. Е. 斯卡奇科夫开始在彼得堡实

<sup>①</sup> Люди и судьбы: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3, стр. 352.

用东方学学院夜校部学习汉语，曾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斯梅卡洛夫<sup>①</sup>（Г. Ф. Смыкалов）带领学生通过阅读报刊文摘学习汉语语法，知识渊博的伊万诺夫<sup>②</sup>（А. И. Иванов）用他在北京出版的教材《汉语初级读本》教汉语课，并专门为学生编写、石印了该书的生词表。汉字、速写、中国地理课等也是实用东方学学院为汉语专业学生所设置的课程。正在 П. Е. 斯卡奇科夫徜徉于汉语世界之中时，1914 年，战争爆发了，П. Е. 斯卡奇科夫应征入伍被派往前线。1917 年被派往韦鲍尔格要塞，俄国二月革命后在沙皇军队任连长，从 1918 年底开始加入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参加了打击高尔察克的战役。在这 4 年里，汉语暂时远离了 П. Е. 斯卡奇科夫。1920 年，П. Е. 斯卡奇科夫担任了西伯利亚总司令部参谋长，在驻地鄂木斯克，П. Е. 斯卡奇科夫有机会与相邻而居的中国人学汉语。

1922 年，П. Е. 斯卡奇科夫转业被派到彼得堡东方应用语言学院。在第一次课上，阿列克谢耶夫提到了梅热夫（Вл. И. Межов）的《亚洲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Азии）、《西伯利亚书目》（Сибир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等书，并郑重地提出了他对学生的一贯要求，必须通过俄语语法课，然后才能开始学汉语。从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的《汉语文选》（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到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的《司空图的诗品》（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到《聊斋》的翻

① 1902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03~1907 年间在中东铁路北京管理处的俄汉学校担任教师，同时担任《远东报》翻译。1908~1910 年间在尼古拉皇家学校担任教师。1910 年起在俄国财政部办公厅工作，1911 年起在彼得堡东方应用语言学院担任教师，教授语法和报章课。

② 1901 年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担任东方学学会东方语言培训班和彼得堡东方应用语言学院的教师，曾任东方应用语言学院副院长、院长，1913 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这一专业的编外教授，是《现代汉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的作者之一。



译，阿列克谢耶夫为 П. Е. 斯卡奇科夫打开的汉语世界“是全新的，从此汉字课文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sup>①</sup> 第二年开始就捧着《辞源》边读边译，第三年则是翻译各类典籍。

1925 年从东方应用语言学院毕业后，П. Е. 斯卡奇科夫被秘密派往中国<sup>②</sup>，在张家口苏军顾问小组工作。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复杂，继而更是军阀争战。支持正规军冯玉祥的苏联军事小组工作复杂而危险。在这期间斯氏有过两次长途旅行，第一次是带队将张家口苏军顾问小组的家属疏散回国，路线是张家口—包头—乌兰巴托—乌兰乌德—哈尔滨—大连—天津—北京。第二次旅行的任务是移送外交信函，路线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上海—汉口—上海—天津—北京。两年的中国生活使 П. Е. 斯卡奇科夫切身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完善了汉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从中国回国后，他先是在军事技术学校任教，后来调到军事政治学院任教。1929 年，调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馆长，一级研究员。

1928 年，苏联出版了《东方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斯氏认为该书内容不够全面，编排上也缺乏科学性，为此，П. Е. 斯奇科夫在《中国问题资料》(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杂志上发表了书评。由此，在斯氏的内心也产生了编写一部真正科学的中国书目的想法。在东方所图书馆工作的这一时期，П. Е. 斯卡奇科夫一直在广泛地收集关于中国的文献信息，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喀山等地的图书馆奔波查索。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系统地总结和批判性地研究了两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汉学领域的全部学术遗产，将 1730—1930 年以后俄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论著、译作编目，于 1932 年出版了《中国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sup>①</sup>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М., 1993, стр. 15.

<sup>②</sup> Записки по памяти (1938—1963).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3, стр. 193.